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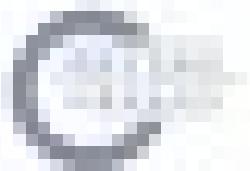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下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Geography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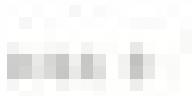
韩茂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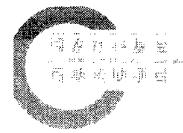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下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下)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Geography of China

下

韩茂莉 著

下 册

| | |
|-----------------------------------|-----|
| ■ 第十章 畜牧业生产及其空间分布 | 749 |
| 第一节 历史上北方非农民族及其经济生活方式 | 750 |
| 一 东北民族、部族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 750 |
| 二 西北民族、部族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 762 |
| 三 北方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稳定性与环境 | 766 |
| 第二节 游牧地带与牧区自然环境 | 768 |
| 第三节 半农半牧区形成与环境变迁 | 773 |
| 一 原始农业类型与空间分布 | 775 |
| 二 半农半牧区的出现与空间扩展 | 779 |
| 三 半农半牧区的空间与生产特征 | 787 |
| 第四节 畜牧业分离与游牧业产生 | 789 |
| 第五节 游牧业与游牧方式 | 794 |
| 一 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 | 795 |
| 二 游牧空间——各有分地 | 816 |
| 第六节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空间变动 | 825 |
| 一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空间变化 | 827 |
| 二 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空间变化 | 833 |
| 三 对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空间变化特征的探讨 | 849 |
| ■ 第十一章 各农业区的发展进程与农业地理基本面貌 | 853 |
| 第一节 东北区的开发与区域开发特征 | 855 |
| 一 辽金时期以西拉木伦河为核心的农业开发 | 856 |
| 二 近三百年以来移民以及东北地区的全面开发 | 870 |
| 第二节 黄淮海区的农业生产与区域特征 | 882 |
| 一 在自然与人文双重因素影响下农业生产发展的不连续性 | 884 |
| 二 明清以来农作物种植制度地域差异与农产品商品性的提升 | 890 |
| 三 淮河流域区域经济与农业生产 | 899 |

| | | |
|----------------|-------------------------|------|
| 第三节 | 东南区的农业发展与区域特征 | 908 |
| 一 | 东南区早期农业与水乡环境利用 | 908 |
| 二 | 经济重心南移与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 922 |
| 三 | 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转型与农业生产集约化经营 | 933 |
| 四 | 人口迁移与东南山区开发 | 940 |
| 第四节 | 长江中游区农业开发进程与地域差异 | 945 |
| 一 | 三大平原自然环境变迁与农业开发空间进程 | 946 |
| 二 | 垸田兴修与两湖平原的全面开发 | 961 |
| 三 | 从“湖广熟天下足”到“湖南熟天下足” | 974 |
| 四 | 移民与山区开发 | 976 |
| 第五节 | 闽台区的农业开发与人口迁移 | 982 |
| 一 | 福建多样性农业开发与土地利用方式 | 982 |
| 二 | 福建移民进入台湾 | 992 |
| 三 | 台湾农业生产区域特征与农作物 | 994 |
| 第六节 | 西南区农业地理与区域发展 | 1003 |
| 一 | 巴蜀地区农业生产与农业地理 | 1005 |
| 二 | 云贵高原农业生产与区域发展 | 1019 |
| 第七节 | 岭南区的农业开发与区域特征 | 1038 |
| 一 | 关于岭南区农业开发基本问题的讨论 | 1038 |
| 二 | 岭南农业开发与农业人口构成 | 1042 |
| 三 | 明清时期岭南区的全面开发与农作物种植结构 | 1051 |
| 第八节 | 西北区的农业开发进程与区域特征 | 1069 |
| 一 | 在政治、军事因素影响下的西北农业开发 | 1069 |
| 二 | 自发性移民与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 1081 |
| 三 | 青藏高原主要农耕区 | 1093 |
| ■ 主要参考书 | | 1097 |
| ■ 索 引 | | 1101 |
| ■ 后 记 | | 1123 |

► 第十章 ◀

畜牧业生产及
其空间分布



畜牧业从属于农业概念之中，“农业”一词的概念含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内涵，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捕捞业、林木业等，即所有为人类生存提供植物与动物衣食之源的产业部门；狭义农业则特指种植业，因此从广义农业角度看，农业不仅有种植业，畜牧业也包含其中。广义农业包含多个部门，虽然每个部门都可以独立构成生产领域，但若从地理角度着眼，唯有种植业（即狭义农业）与畜牧业形成各自占主导的分布空间，并依托地理优势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畜牧业不仅有别于其他非农生产部门，而且有着可与种植业比肩的经济、政治地位，因此本文在对北方民族经济生活方式进行整体回顾的同时，将研究重点落在游牧民族及畜牧业。

第一节 历史上北方非农民族及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非农民族，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有的以渔猎、采集为主，有的则过着游牧生活，抛开族属、族源等问题，仅从地理方位上看，分布在北方的非农耕民族可以分为东北、西北两大部分。对于这些民族，早期的历史文献曾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后来逐渐有了明确的称呼，历史上活动在东北地区的先后有濊貊、肃慎、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室韦、库莫奚、豆莫娄、乌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满等民族或部族，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则有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回纥、薛延陀、沙陀、吐谷浑、党项、蒙古等民族或部族。关于这些民族的源流、历史、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方式、信仰以及文化习俗，中外学者已经作了大量研究，为了论述方便，本节仅就北方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做简单的回顾。

一 东北民族、部族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一）濊貊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濊貊是先秦时期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诸族的总称，对于濊貊的源流与族属问题中外学者曾有过广泛研究，白鸟库吉、池内宏、和田清、金毓黻等认为濊貊为统一民族；鸟居龙藏、三上次男等则提出濊、貊为两族的观点。80年代孙进己结合考古发掘的新近成果，就濊、貊为不同族的问题又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证，并证明濊、貊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包括了许多民族的复合体。濊貊一词始见于春秋，《管子·小匡篇》载：

齐桓公“北至孤竹、山戎、秽貊”，西汉时期屡见于各类文献。濊貊各族分别起源于濊、貊两系，濊居住地区偏东，约在今吉林省及朝鲜半岛北部，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貊居住地区偏西，约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西部，后来也有部分貊人东迁到濊人的居地，貊人主要从事畜养业^①。由于濊貊是一个多民族复合体，因此包容在这个复合体内的诸多部族的分布范围很广，除上文所述濊、貊活动的核心地区外，嫩江、松花江流域都留下他们的活动遗迹，在这一广大范围内因生存环境不同，形成各种有异于核心地区的生产方式。

（二）肃慎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肃慎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又称“稷慎”、“息慎”，文献中屡有关于这一民族的记载。《竹书纪年·五帝篇》载：“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史记·五帝本纪》亦称：“虞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确定肃慎人的活动区域是研究肃慎经济文化的基础，对于肃慎的位置，《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这样的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即今长白山。郭璞注《山海经》更具体地说明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吉林通志》又对郭璞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汉晋千里，大抵得今里六百有余。晋辽东为今辽阳州地，以道里考之，正当在宁古塔”，即其活动中心为今牡丹江流域为主的地区。陈连开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时，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进一步指出肃慎活动区域并非局限于牡丹江流域，今长白山以北，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以南均为这一民族的活动范围^②。

肃慎人活动区域大部分以森林为主，间有森林草原与湖沼、河流，环境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以渔猎为主的生存背景。从虞夏时期起肃慎即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往来，西周初年“武王克商，道通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其长有咫”^③。在此后肃慎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历史中，楛矢、石砮之类射猎工具仍然是主要供品，如魏明帝青龙四年五月，“肃慎氏献楛矢”^④。魏元帝景元三年四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⑤。晋元帝“大

^①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25页。

^② 张锡彤、王钟翰、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③ 《国语》卷五《鲁语》下。

^④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⑤ 《晋书》卷二《文帝纪》。

兴二年八月，肃慎献楛矢、石砮”^①。从肃慎人的主要贡物为楛矢、石砮来看，不仅制造精良的射猎工具是这一民族的特长，而且使用射猎工具从事渔猎活动，更是这一民族长期沿用的生产方式。肃慎人与渔猎生产相佐的是半定居生活，间有少量种植业的经济生活方式，这一点郭璞注《山海经》时就留下了相关的记载，肃慎“穴居无衣，衣猪皮，冬以膏涂体厚数分，用卻风寒。其人皆工射，弓长四尺劲强，箭以楛为之，长尺五寸，青石为镝”^②。猪的饲养是定居、半定居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考古工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断。佟柱臣、江应梁等认为西团山文化与莺歌岭遗址属于肃慎文化遗存^③，对此佟柱臣在其著作中指出西团山文化分布东起长春，西止桦甸，南自怀德，北到德惠，从有关器物来看这是一个以素面砂质陶壶、陶罐、陶钵、陶碗、陶鬲、陶纺轮、半月形石刀、柳叶石镰、叶状有翼石镰、野黍、金色狗尾草为代表的文化，属于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址中不但发现石棺盖石上放有猪下颌骨，而且还发现男性墓中多石镰，女性墓中多纺轮，男女分工明确的现象^④。莺歌岭遗址位于镜泊湖东岸，遗址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文化年代约在商周之前，上层文化在商周之际。属于莺歌岭遗址下层类型的器物主要有罐、碗、纺轮等陶器，锄、斧等石器以及骨针、鹿角锄等骨、角器，同时在这一文化类型遗址中还发现两座房屋建筑遗迹。莺歌岭上层文化类型中各类器物明显增多，陶器中尤可称道的是各种形态逼真的陶猪、陶狗等动物造型。在这一文化层中石器制作较为精良，以磨制石器为主，并兼有压制石器，磨制石器多为斧、锛、矛、镰，压制石器中除石片刮器，也有镰、矛等。莺歌岭上层文化类型的骨制品主要有针、锥、簪、匕、凿等，用于制作骨制品的材料有鱼刺、野猪牙、蚌以及其他动物骨骼。各类器物之外考古工作也发现了属于这一文化类型的两座房屋遗址^⑤。

西团山文化与莺歌岭遗址的器物类型显示出基本相似的生产与生活特征，从镰、矛等生产工具以及各类骨制品的原材料可以看出渔猎是这里主要的生产手段，而各类陶器则表明人们在从事渔猎的同时，也过着半定居的生活，猪、狗的驯化与饲养以及房屋的出现都透露出半定居生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② 《山海经》卷一七《大荒北经》郭注。

^③ 佟柱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9～10页。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页。

^④ 佟柱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9～10页。

^⑤ 谭英杰、孙秀人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5页。

活的信息。考古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中对于肃慎人的描述两相吻合，展示了生活在长白山、牡丹江流域、黑龙江、松花江下游一带森林以及森林草原地带肃慎人以渔猎为主的半定居生活面貌。

(三) 挹娄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挹娄，古肃慎国也。”汉以后有人仍袭肃慎旧称，也有人称肃慎为挹娄，其分布范围与前述肃慎人活动区域基本一致。这一时期各类文献对于挹娄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后汉书》中的有关记载最为详细，挹娄“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处于山林之闲，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种鱮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①。范晔此番对挹娄的描述与郭璞对肃慎的描述极为一致，考古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黑龙江宁安东康遗址位于牡丹江流域，利用C¹⁴对遗址陶瓮中的粟、黍进行年代测定，结果为公元前70±105年，正是人们改称肃慎为挹娄的时期，因此东康遗址被认为是挹娄人的文化遗存。这一遗址中的陶器有瓮、罐、钵、碗、杯、豆等；石器多为各类工具，主要有斧、锛、凿、刀、镰、铲、矛、镞、磨盘、磨棒；骨角器则包括生产与生活用品，如锥、针、簇、簪、凿、纺轮、甲片、钩网器等，除上述器物外遗址中还发现四座半地穴式的房址，以及贮藏在陶瓮中的粟、黍^②。

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我注意到随着历史的发展肃慎—挹娄人的经济生活虽然增添了一些内容，但以渔猎为主，佐以少量采集与农业的半定居生活主旋律没有变。

(四) 夫余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夫余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以后又在《汉书·地理志》、《三国志·夫余传》等文献中有了进一步记载，其中《三国志·东夷传》称：“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千里，户八万。”这是汉晋时期东北地区一个重要民族，陈连开认为夫余北界可至嫩江中下游以及松花江、拉林河、阿什河

^①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② 谭英杰、孙秀人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9页。

流域，但其核心地区主要在今吉林至辽东一带^①。从目前学术界对夫余的研究来看，在夫余与濊貊存在承继关系上形成共识。夫余与濊貊之间的承继关系不仅表现在分布范围、活动地域上，而且也反映在经济生活方式上。《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夫余）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三国志·东夷传》则称夫余君王之下“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其各部皆从属于诸加管辖。各类文献记载展现了夫余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的经济生活特征。

（五）勿吉、靺鞨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金毓黻认为勿吉即为挹娄之异称^②，勿吉兴盛于北魏时期，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区及松花江下游一带，唐代改称靺鞨。这里是中国东北气候最湿润的地区，降水量一般在600毫米左右，个别地区可达800毫米，地面江河湖沼密布，史称“其地下湿”^③。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畜牧业显然十分不便。《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人）无牛，有车马……多猪无羊。”猪属于家畜，养猪是依附定居家庭的家庭饲养业，牛羊马才是畜牧业的主要经营对象。勿吉无羊，无牛，虽有马，但数量有限，主要用于骑乘，《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车用人推，而不使用牛马；《新唐书·北狄传》也记载靺鞨人善于步战，而不像游牧民族那样以骑射为长技。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勿吉人的生产结构中畜牧业成分是十分微弱的。勿吉经济生活以狩猎和农耕为主，长白山、老爷岭等山地都是著名的针阔叶混交林分布区，林中有虎、豹、熊、狼等兽类；松花江平原的森林草原环境则主要是食草动物的栖息之地。勿吉人“善射猎”，主要工具为弓箭，“弓长三尺，箭长二寸，以石为镞”。为了更有效地猎取动物，还发明了毒箭，常于“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这种弓箭效力甚大，“中者便死”。为了捕获更多的动物当地还有一个奇异的习俗，即父母若死于秋冬，后人就用他的尸体为捕貂诱饵，“貂食其肉，多得之”。勿吉人所种植的农作物为“粟及麦穄”，“菜则有葵”。从文献记载勿吉人衣着“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的情形来看，他们应种植有一小部分纤维类作物^④。靺鞨人承勿吉旧习，也保持着狩猎与农耕相混杂的经济生活。

^① 张锡彤、王钟翰、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页。

^② 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翻印，第78页。

^③ 《魏书》卷一〇〇《勿吉传》。

^④ 《魏书》卷一〇〇《勿吉传》。

(六) 豆莫娄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陈连开认为豆莫娄为5世纪北迁至嫩江、松花江流域的夫余人，其活动区域主要在松花江平原，大约唐代融入靺鞨，成为其中一个部落。豆莫娄分布区域地势平坦，历史文献描述说：“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宜五谷”，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支持下，豆莫娄人生活上已有了不同于其他非农耕民族的改变，不但使用中原农业民族惯用的餐具，“饮食亦用俎豆”；并且以麻布为衣，幅阔身宽。松花江平原自然景观属于森林草原，除发展农耕业之外，也是从事畜牧业的良好场所，在《魏书》、《北史》有关豆莫娄的有限记载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畜牧业，但却记载其“君长均以六畜名官”；另外其民间有杀妒妇之习，待其尸体腐后，女家需输牛马才能收尸^①。这说明在豆莫娄的经济生活中，尽管衣食主要来自农业，畜牧业也占有一定地位，经济结构表现为农耕、畜牧混杂型。

(七) 女真、满人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女真人起源于黑水靺鞨，渤海国覆灭后，这部分原隶属于渤海国的黑水靺鞨陆续名为女真^②。辽建国后，辽太祖为防止女真为患，将部分女真迁离原居地，并把他们编入直接管辖的户籍内，号熟女真，未入籍者称为生女真。熟女真与生女真之间大体以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为界，此界以北为生女真，以南即熟女真^③。女真的生产形式基本以渔猎、畜牧为主，杂有简单的农耕活动。熟女真“皆杂处山林，尤精弋猎，有屋舍……耕凿与渤海人同”。生女真“居民屋宇，耕养、言语、衣装与熟女真国并同”^④。女真人的畜牧业颇具规模，统和四年（986年），辽军队“讨女真，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⑤。统和二十八年，“女真进良马万匹”^⑥。除畜产品外，女真人生活的长白山区，盛产蜜腊、人参、松实、白附子等，这些均成为女真人进行商贸交往的重要物品^⑦。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则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猎获物，在各类猎获物中，海东青尤其为人称道，是女真人每年向辽人进贡的主

^① 《魏书》卷一〇〇《豆莫娄传》。

^②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④ 《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里远近》。

^⑤ 《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⑥ 《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⑦ 《契丹国志》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要物品^①。

金王朝建立后，女真人作为王朝的建立者出现了较大分化，一部分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而进入中原地区，并逐渐同化到中原民族中；一部分驻守在辽故地以及东北各军事交通要塞，最终融入东北各民族中；还有一部分女真人留守在女真故地，即以依兰、阿城为中心的松花江流域，这部分保持着“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传统习俗的女真人^②，于明初逐渐南迁，并形成东海、海西、建州女真三大部，其中东海女真基本留居女真故地，即松花江中下游至黑龙江流域，保持着以渔猎为主兼营少量采集与农业的生产方式；海西女真迁至松花江中游，大部分人从事以定居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建州女真南迁幅度最大，其分布区主要位于今抚顺以东，至长白山东麓、北麓一带，由于距离中原王朝最近，受中原文化影响也最大，依托适宜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颇有成效，为此《建州闻见录》中有这样一番描述：“土地肥沃，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建州女真在女真各部中脱颖而出，于17世纪上半叶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满洲人。

（八）乌桓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乌桓是两汉至十六国时期北方草原地带的重要民族，《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称：“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乌桓族得名于乌桓山并非出于偶然，从乌桓国灭之后乌桓人最终退保乌桓山来看，显见乌桓山对于乌桓人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或许是乌桓人祖先的纪念地，或许是乌桓人的发祥地，无论是哪种可能，乌桓山的位置都应与乌桓人早期活动中心相关，因此当国灭之后，乌桓人丧失了所有的土地，最终不能丢掉的当是这一民族根之所系。乌桓山对于乌桓人如此重要，确定乌桓山的位置自然也就明确了乌桓人的早期活动中心。文献中对于乌桓山的位置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丁谦《后汉书乌桓传地理考证》认为：“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蒙古语红曰乌兰，故《传》中又称为赤山乌桓。”且《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中又提及乌桓人“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之说^③，因此后代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处以“乌兰”相称的山大有可能就是当年的乌桓山。

^① 《契丹国志》卷二六《诸藩国杂记》。

^②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

^③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卷二《明帝纪》。

根据这一观点，多认为清人张穆《蒙古游牧记》中所及阿鲁科尔沁旗北、大兴安岭南端之乌兰峰即乌桓山，近年这一看法被更多学者接受^①。此外就乌桓山的位置，贾敬颜还提出与前述观点略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宋、辽文献记载契丹有人死魂归黑山的习俗，契丹与乌桓、鲜卑本存一定的族属关系，乌桓人魂归赤山与契丹人魂归黑山，两山应有一定的联系且位置相近，根据宋、辽文献推断《辽史·地理志》所载庆州黑山应即契丹亡人所归之黑山，而同文内又载庆州内有赤山，此赤山当为乌桓山。黑、赤二山相距很近，处于今巴林左旗北一百余里，均属大兴安岭南端山地^②。两种观点虽然不同，但其结论都将乌桓山的位置定于大兴安岭南端，可见这里确与乌桓人的早期活动有着重要关系。

大兴安岭南端属于以灌木草原为主的景观风貌，与环境吻合，起源于这里的乌桓人持以游牧、射猎为主的生产方式，“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随着后来乌桓与中原民族的频繁接触，也杂有少量的农耕成分，主要农作物为穄^③。

（九）鲜卑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鲜卑与乌桓同出于东胡，《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称：“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国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鲜卑族得名与鲜卑山相关，因此鲜卑山的位置是探讨鲜卑人的起源地以及早期活动中心的关键。确定鲜卑山的位置比乌桓山复杂得多，在鲜卑人的发展历程中，随着民族到处迁徙，亦把所到之处的大山均称为鲜卑山，因此在可考文献中被视为鲜卑山的不止一处。如《通典》中就提到两处鲜卑山，一处位于柳城东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另一处位于辽西，《清一统志》根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所载鲜卑“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推断应在辽中京大定府一带。

在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对鲜卑源地进行多方位研究的同时，考古学界根据各类遗址的发掘，也提出不同观点，如将鲜卑山定在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北、通古斯卡河南就是在考古工作基础上形成的观点。1959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发现鲜卑墓群，引起了

^① 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王文楚撰写“乌桓山”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② 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1页。

^③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

学术界对鲜卑山位置的重新审定。60年代马长寿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指出，鲜卑祖先石室应在额尔古纳河与嫩江之间的大兴安岭中。70年代宿白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一文中论证了鲜卑拓跋部的起源、南迁。1980年年初米文平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大兴安岭北端发现嘎仙洞，并提出这就是鲜卑旧墟石室，数月后在针对嘎仙洞继续进行的深入调查中，终于在苔垢覆盖的崖壁上发现《魏书》所载北魏中书侍郎李敞祭旧墟石室刻写的祝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了嘎仙洞就是鲜卑旧墟石室。

由于嘎仙洞的发现，使学术界更多地倾向于鲜卑山即位于大兴安岭北端的观点，但由此即将这里视为鲜卑人的起源地，在很多问题上还很牵强，因为鲜卑与其他草原民族相似，均具有在迁移过程中将其他部族融入其中的特征，故鲜卑各部往往具有不同的习俗、居地。大兴安岭北端仅为鲜卑拓跋部的起源地，而同属于鲜卑族的慕容部主要活动在辽西、辽东一带；宇文部则与匈奴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从阴山南迁至辽东塞外融入鲜卑民族中^①。

鲜卑、乌桓同出于东胡，最初乌桓居南，鲜卑在北，以后鲜卑南下拓地于东西，乌桓蹙居于辽西一带。环境是人们选择、决定生产方式的基础，鲜卑人特别是拓跋鲜卑在从大兴安岭北端南下过程中，历经大兴安岭东麓森林草原、湖沼岸滩，进入西拉沐伦河、老哈河一带灌木草原地带，生产方式也经历着由畜牧、渔猎并存向游牧转移的过程，《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称鲜卑有“野马、原羊、角端午”，又出“貂、豹、驥”等以皮毛柔软而著称的名裘。野马、原羊是生长在温带草原上的动物，貂、豹则为寒温带森林中的动物，两者分别来源于畜牧业与渔猎，随着鲜卑人南下与拓地东西，适应草原环境，游牧成分越来越大。

(十) 室韦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北魏时期东北各民族之中室韦的地域范围最广，它据有今黑龙江省北部及俄罗斯境内的一部分。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中这一区域基本属于东北湿润、半湿润森林及森林草原区^②，区内大小兴安岭与嫩江平原分别构成了景观生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地理单元，其中室韦所在的大小兴安岭北端已进入寒温带范围之内，除气温较低之外，以针叶林为主的植

^①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9页。

^② 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被构成这里主要环境特征；与山地不同，嫩江平原主要是森林草原景观。由于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各地室韦人生产形式并不一致。文献记载室韦人“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①；又云“丈夫索发，用角弓，其箭尤长……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裤，有曲酿酒”^②。这些记载说明，室韦的生产形式至少包括狩猎、畜牧与农耕三种成分。

室韦人分布的环境特征表明，狩猎应当在它的生产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有关学者研究，室韦这一族称为蒙古语森林之意，室韦人则泛指林中之人^③。室韦人分布区内森林面积广大，这些居民以森林为族称，是很自然的事情。林区“多草木，饶禽兽”^④，为室韦人从事狩猎业提供了条件，此外以嫩江平原为核心的森林草原地带也是进行狩猎的极好场所。由于长期从事狩猎活动，室韦人“尤善射”，并以使用独特的长箭而著称。他们猎获动物后，用肉作食品，皮毛则制成衣裤。猎获物之中鹿、貂的数量最大。这些动物的皮毛除供本族男女穿用之外，还因数量大而被数千里之外的中原王朝闻知，并作为贡品送纳至京城。“食肉衣皮”解决了室韦人生活的基本需求^⑤，因而狩猎活动也就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畜牧业是室韦经济生活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室韦人活动范围内，嫩江平原是良好的牧场，依托自然环境，“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这样的畜牧业具有明显的半游牧性质。受森林草原环境所限，牲畜中无羊，以牛为主，马的数量也很少，故《北史》、《隋书》、《新唐书》都有“无羊少马”这样的记载。正因为如此，马显得十分珍贵，室韦人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作为惩罚的规定^⑥。室韦不是农业民族，但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也发展了少量种植业。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粟、麦及穄”。收获物并不主要用作食物，而是大多用来酿酒，据文献记载农业垦殖仅是南部室韦的生产行为。

室韦人不但分布范围广大，而且内部族属构成也比较复杂。隋代室韦分为五大部分，即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南室韦位于契丹之北，主要活动区域在嫩江平原。自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路程，便到北室韦之地。再向北是钵室韦的居地，深末怛室韦在钵室韦

^① 《魏书》卷一〇〇《失韦传》。

^② 《北史》卷九四《室韦传》。

^③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 《隋书》卷八四《北狄传》。

^⑤ 《隋书》卷八四《北狄传》。

^⑥ 《魏书》卷一〇〇《失韦传》。

的西南，他们的西北是大室韦的居地。隋代室韦诸部中，北室韦的生产活动以渔猎为主，钵室韦与北室韦相同，深末怛室韦为穴居游猎，大室韦的生存方式也基本类似，唯有南室韦在畜牧业中杂有少量的农业垦殖活动^①。当时嫩江平原“土地卑湿”，湖沼密布，特别是春季土地解冻时，地面到处出现翻浆现象，很难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普遍开发农业有很大困难。南室韦人中虽然出现了农耕业，但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甚至直到唐代仍然处于“有牛不用”，“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的状态，因而产量很低，“田收甚薄”^②，显然农业生产在其生产结构中还处于非常次要的辅助地位，并没有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唐代室韦各部虽然又有了新的分化组合，但在原有生态环境下，建立的经济生活方式并没有变化。

（十一）乌洛侯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乌洛侯大致分布于今嫩江支流淖尔河一带，这里同时也是室韦人的活动区域，特别是隋唐以来，随着室韦人不断南下，不但在活动地域上与乌洛侯互有交叉，而且在族属上也逐渐趋于同化。根据《魏书》和《北史》的记载，乌洛侯所居之地“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这与历史文献对室韦，特别是南室韦活动区域的描述很相似，均表现出江河沿岸地带的自然环境特征。在生产形式上乌洛侯“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皮服……好猎射”^③。这一切都与南室韦相近，显示出融狩猎、畜牧、农耕三位一体的经济生活方式。

（十二）地豆干经济生活方式与分布地域

根据文献记载考证，地豆干分布地域大致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内乌拉根郭勒河流域，地理环境往往对一个民族的生产形式具有很强的制约性，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下的社会发展初级阶段，这种制约性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东乌珠穆沁旗位于大兴安岭西侧，大兴安岭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山脉东西两侧，自然地理特征大不相同，其中湿润度的变化尤为突出。大兴安岭以东地区降水量一般均在400毫米以上，属于半湿润地区，呈草原及森林草原景观；大兴安岭以西地区由于大兴安岭山脉的阻挡，降水量锐减，一般在400毫米以下，逐渐进入

^① 《北史》卷九四《室韦传》。

^② 《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

^③ 《魏书》卷一〇〇《乌洛侯传》。